



天師傳播文庫

TSCBWK

《大公报》 专刊研究

李秀云 著

新华出版社

《大公报》专刊研究

(1927—1937)

李秀云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公报》专刊研究/李秀云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12
(天津传播文库)

ISBN 978 - 7 - 5011 - 8214 - 5

I. 大… II. 李… III. 大公报—研究 IV. 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7479 号

《大公报》专刊研究

作 者: 李秀云

责任编辑: 池 平

装帧设计: 王晓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1 - 8214 - 5

定 价: 20.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312) 2838225



李秀云

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已出版专著两部：《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12月）、《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合著一部：《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新华出版社2005年6月）。现主持省（部）级课题两项，参与国家级课题两项。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天师传播文库

- ☆ 新闻发布案例透视 / 殷莉
- ☆ 全球化与国际平衡传播 / 赵雅文
- ☆ 中国新闻传播史论 / 马艺
- ★ 《大公报》专刊研究 / 李秀云
- ☆ 广告摄影构成 / 刘杰 宋世信

责任编辑 池 平
封面设计 晓 明

高擎学术理想大旗（代序）

童兵

在喜迎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之际，《天师传播文库》丛书出版了。一个来自渤海之滨的新闻传播学术团队，以一种锲而不舍的守望精神，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征途上，不畏艰辛，甘于寂寞，孜孜以求，薪传火继。这支志同道合、相互扶掖的队伍，几十年来，高扬学术理想，追踪学科前沿，坚守学术阵地，不事声张，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为天津地区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默默地吐蕊抽丝，做出自己的努力，也为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是天津学界的好事，同时也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件好事。

天津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起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这在国内也是较早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之一。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已经成为国内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新闻与传播教学科研院所，为天津地区、环渤海和全国部分地区大众传播界以及政府、企业、军队等单位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专业人才。近三年来，这支学术团队承担着很多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一批教学与科研成果不断问世。《天师传播文库》丛书就是他们近三年又一批科研新成果。我有幸在丛书问梓之际，阅读了部分书稿，对丛

书的结构设计和相关内容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我感到这套丛书有三个特点：

一是丛书作者有着强烈的学术追求与学术自觉。学术是有着独立学理地位的系统学问。学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学术主体具有崇高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理想。学术自觉在于对学术精神执著的追求和学术理想的自觉意识。新闻传播学者最可宝贵的学术精神就是求真务实。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这是做学问的精髓所在。但要看到，仅有学术精神还是不够的，这种学术精神的背后必须有崇高的学术理想作为支撑。新闻传播业作为社会良知系统，其终极的人文关怀同样也是新闻传播学者的终极目标追求。因此，做学问，需要树立理想，没有理想，思想就会贫瘠，没有理想，学问就会失去灵魂。这套丛书不少选题就充满了新闻传播专业主义的理想追求。

二是丛书作者立足现实，关注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坚定我们的学术理想，还需要面对现实，脚踏实地。我们做学问，搞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就是要为人类可持续、健康发展设计未来蓝图，如若无视现实，学问再“大”也是无用的学问，即使作了学问，也会僵化，也会成为不切实际的清谈。因此，崇高的学术理想必须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才能富有学术生命力，这套丛书体现了这一特征。

三是丛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中青年教师，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是一支思想活跃很有后劲的教授、博士学术团队。许多著作是作者承担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总之，从这支学术团队不懈的追求中，我看到了他们的梦想。正因为有了梦想，学术生命才有了希望；从他们的著作中，我看到了他们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学科

发展才有希望；从他们的精神中，我看到了来自渤海之滨的新闻传播学界繁荣发展的未来。

只要付出辛苦与汗水，甘于寂寞，十年寒窗，梦想定会成为现实，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遵编者之托，书是为序。

目 录

高擎学术理想大旗 (代序)	童 兵 (1)
绪 论	(1)
第一章 《大公报》专刊发展概况	(19)
第一节 《大公报》专刊的发展过程与特点	(19)
第二节 《大公报》专刊的发展动因	(33)
第二章 《大公报》专刊与社会生活	(51)
第一节 《妇女与家庭》与妇女生活	(51)
第二节 《摩登》与青年生活	(77)
第三节 《电影》、《体育》与休闲方式	(87)
第三章 《大公报》专刊与科学普及	(114)
第一节 《科学周刊》、《科学副刊》与科学知识普及	(114)
第二节 《医学周刊》与医学知识普及	(130)
第四章 《大公报》专刊与学术研究	(149)
第一节 《现代思潮》、《世界思潮》与哲学	(150)

■ 《大公报》专刊研究

第二节	《社会研究月刊》、《社会问题》、《乡村建设》 与社会学	(170)
第三节	《政治副刊》、《社会科学》与政治学	(186)
第四节	《经济周刊》与经济学	(200)
第五节	《明日之教育》与教育学	(212)
第五章	《大公报》专刊的历史贡献	(226)
第一节	爱国主义主线	(226)
第二节	报纸的服务化	(238)
第三节	内外兼修的办刊理念	(244)
主要参考文献		(261)
后 记		(273)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中国报纸诞生之初，没有副刊，只有一些副刊性的文字。1872年4月30日，上海《申报》创刊之初，专门设置“文艺”一栏，把文艺性的作品作为报纸的一项固定内容放在新闻之后。这些文艺性的作品虽然被人称作“报屁股”，但毕竟拥有了固定的版面位置，“开副刊之先声”^①。1897年11月，上海的《字林沪报》出版《消闲报》，随正张附送，近代中国中文报纸的第一份正式副刊诞生了。此后，中文报纸陆续拿出版面设置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日渐成为报纸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五四”时期，中文报纸不仅设有文艺性副刊，又开始设置专门性副刊，简称专刊。《时报》于1919年2月24日创办的《教育周刊》，是我国报纸最早的专刊。《申报》也于1919年8月31日创办了介绍国际关系问题的专刊《申报星期增刊》。

20世纪20年代，中国报纸专刊异军突起。《时报》继《教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3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育专刊》之后，又发刊《妇女周刊》、《文艺周刊》、《实业周刊》、《时代思潮》、《图画周刊》、《学术周刊》、《汽车周刊》、《图画时报》等十余种。《民国日报》也创办了每周按日发行的专刊，共七种，即《艺术评论》、《文艺周刊》、《妇女周刊》、《教育周刊》、《政治周刊》、《平民周刊》、《科学周刊》，一周轮一遍。《申报》则创办了《常识》、《平民周刊》、《汽车增刊》、《本埠增刊》、《商务》等专刊。北方新闻重镇《大公报》则创办了《白雪》、《妇女与家庭》、《电影》、《戏剧》、《儿童》、《文学副刊》、《体育》、《艺术周刊》、《公开评论》、《科学周刊》、《市政周刊》、《医学周刊》等十余种。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报纸专刊发展的鼎盛阶段。据统计，上海《申报》在1932年至1937年间创办的专刊、增刊和专栏达46种^①。天津《大公报》在1930年至1937年间创办的专刊则多达三十余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报纸专刊不仅从综合性、文艺性副刊中独立出来，而且在版面与篇幅上远远超过了综合性、文艺性副刊。专刊的产生与繁荣，成为现代中国报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当时中国报业的发展历史，这正是进行报纸专刊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1902年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至今仍在香港继续出版，“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的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惟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②。《大公报》作为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见证者，近年来学界

①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第79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前言》，第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对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方汉奇等的《〈大公报〉百年史》、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侯杰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任桐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1927—1937）》、贾晓慧的《大公报新论》、王芝琛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等。另外，还有百余篇学术论文相继问世。上述成果对于《大公报》百年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大公报》的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立场，对于《大公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等，作出了全面、客观、公允而深入的评价。

百年《大公报》可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新记时期、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就历史阶段而言，有关新记时期《大公报》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上述如吴廷俊、任桐、贾晓慧、王芝琛的著作都是对这一时期的《大公报》进行专门研究。他们的成果要么从《大公报》的社评出发，要么从《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入手，抑或以新闻通讯为切入点，以再现新记《大公报》的历史原貌，评价其历史地位与影响。综观学界对于新记《大公报》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我们忽视了对新记《大公报》副刊与专刊的研究。

纵观《大公报》百年发展史，王郅隆时期“是最缺乏民主独立精神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经营管理的低谷，创下发行量最低的纪录”^①。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组建新记公司，于1926年9月1日开始续刊《大公报》，报名、馆址和职工，都一仍旧贯。对新记大公报人来说，形势颇为严峻，他们必须迅速打开局面。为此，他们采取了种种举措，而且收效

^①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第169页。

显著。续刊之初，报纸销量不足 2000 份，广告收入每月仅 200 元左右。当年年底，报纸销量增至 2 万多份，广告收入每月 6000 多元。新记《大公报》之所以能迅速打开局面，原因很多，如确立以“四不主义”为核心的办报宗旨；组建以“开国五虎大将”^①为核心的人才队伍；增添必要的设备和器材；完善机构设置，加强经营管理等等。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高度重视副刊。《大公报》续刊之初，就创办了综合性文艺副刊《艺林》。1927 年 3 月，又创办了综合性副刊《铜锣》。1928 年元旦，颇负盛名的《小公园》创立。更难能可贵的是，新记《大公报》不仅创办综合性副刊，而且从续刊的第三个月，即从 1927 年元旦就开始创办专门性副刊，如《白雪》、《妇女与家庭》、《戏剧》、《儿童》等。从 1927 年至 1937 年天津沦陷前，《大公报》先后创办的专门性副刊多达三十余个，另外还有数十个不定期出版的特刊。这些副刊、专刊为《大公报》续刊后打开局面确实出力不少，正如大公报人曹世瑛所说：“新记大公报只用了两年时间就站稳脚跟，原因很多。它的专电、通讯、社评、标题、拼版，以及医学、戏剧、艺术、妇女、儿童等周刊，都是重要的因素，副刊《小公园》也起了重要作用。”^② 因此，我们在对新记《大公报》的社评、星期论文、通讯、新闻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其副刊，尤其是专刊的研究力度。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本书对《大公报》副刊之重要组成部分——专刊进行系统的研究，或许多少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① 指王佩之、李子宽、金诚夫、何心冷、杜协民五人。

② 曹世瑛：《从练习生到外勤课主任》，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 128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年版。

二、学术史回顾

有关《大公报》副刊的总体研究，最有分量的是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2版）。该书以三章的篇幅分别研究了新记《大公报》创业时期（1926—1928）的副刊和专刊、发展时期（1928—1936）的副刊和专刊、鼎盛时期（1936—1945）的专刊和副刊。该书将《大公报》这三个时期副刊与专刊的发展特点概括为：社内社外结合，副刊专刊齐全；为国事而创设，因形势而变化；形式多种，主题一个。

王灿发在对20世纪30年代《申报》副刊、专刊的研究中，将《申报》副刊、专刊与《大公报》副刊、专刊进行对比，概括了30年代《大公报》副刊、专刊的发展特点^①：《大公报》副刊的传播价值取向是传播人文社科知识，开启民智，教化民众；从副刊的设置看，《大公报》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类的各种专门性副刊。

冯并在其《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设有“异军突起的《大公报》周刊”一节，简述了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专刊的发展概况。周雨的《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则设有“内容多样的专刊和文艺副刊”一章，但内容较为简略。

有关《大公报》副刊、专刊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了系列成果。其中有关文艺、文学副刊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

陈昌凤在描述《小公园》、《文艺》、《大公园》的创办与发

^① 王灿发：《现代报纸副刊专刊透视——30年代〈申报〉副刊研究》，第211、213页，远方出版社，2005年版。

展过程后，这样概括《大公报》三个有名的副刊的发展特点^①：《小公园》里春意盎然，《文艺》战线百花齐放，《大公园》中“荆棘”丛生。

刘淑玲对《大公报》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专门研究^②。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文学副刊》到30年代的《文艺副刊》、改造后的《小公园》和《文艺》，从抗战时期的《战线》至抗战胜利后的《星期文艺》，《大公报》以论政而不参政的独特方式，向往文学的独立性，希望文学超越政治影响，保持自身的纯粹和完美，从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期间，《大公报》发表过无数作品，推介过诸多作家。这些作品和左翼文学的相互映照和反差，既表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复杂性，也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丰富性。

《小公园》是《大公报》影响最大的一个综合性文艺副刊。刘淑玲从京派文学的角度，对《小公园》进行研究^③。她指出，《小公园》以市民阶层为主要读者对象，以轻松、趣味和消闲为主要特征。1935年，萧乾开始主编《小公园》后，使其面貌完全改观，成为一个纯文学副刊，作品的文学水准大幅度提高，不到两个月就成为京派文学的重要阵地。

《文学副刊》是一个纯文学性副刊。沈卫威指出^④，吴宓主编

① 陈昌凤：《蜂飞蝶舞：旧中国著名报纸副刊》，第120—13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③ 刘淑玲：《由消闲趣味的通俗读物到京派文学阵地——京派作家对〈大公报·小公园〉的改造》，《中国编辑》，2005年第2期。

④ 沈卫威：《〈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新人文主义的张扬》，《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3期。

的《文学副刊》是《学衡》的同路刊物，由于报纸作为大众传媒发行量大且速度快，“学衡派”的势力和影响，因此从相对狭小的学术界渗透到北方最有实力的大众传媒。吴宓通过探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张扬古典主义，反对浪漫主义；同时宣扬新人文主义，影射、批评中国白话新文学。沈卫威还探讨了《文学副刊》与新文学的关系^①；吴宓主编的《文学副刊》本是反对新文学的，但由于朱自清的介入和时代的急剧变化，刊物逐步向新文学让步，最终被沈从文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所取代。

刘霖从媒介与文学译介之关系的角度，对《文学副刊》进行研究^②。通过对《学衡》与《大公报·文学副刊》中文学译介活动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文学翻译在同人刊物和大众媒介中所承载的不同意义与呈现的不同形式：前者是“五四”话语系统内的重要文学译介载体，其译介关乎文学社团的整体形象，必须与团体所标榜的宗旨和口号相符；后者面向大众，同人刊物时期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日渐淡薄，译介的内容和方式求新图快，更多染上商业化和体制化的色彩。

吕明涛从吴宓日记出发，探讨吴宓与《文学副刊》的关系^③。他指出，吴宓怀抱“报业救国”的理想赴美留学，又怀抱“报业救国”的理想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是一个“反西方的西方主义者”，当人们理解了吴宓的这种两难心态，自然就理

① 沈卫威：《〈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新文学姻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② 刘霖：《传播媒体与文学译介——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理论界》，2007年第2期。

③ 吕明涛：《吴宓与〈大公报·文学副刊〉》，《书屋》，2003年第4期。